

麥田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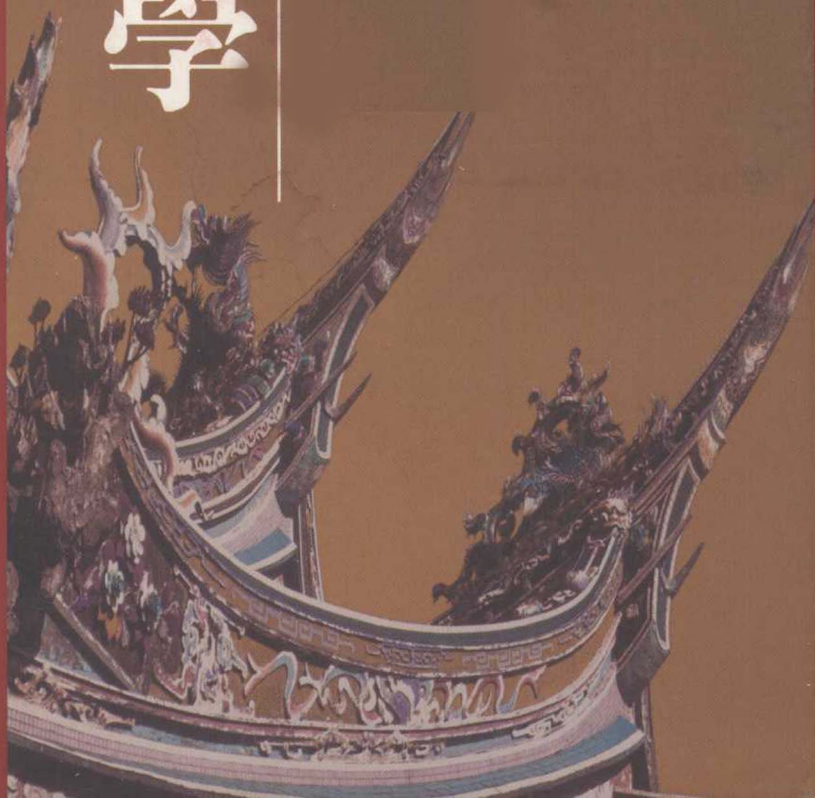
1950-2000

50年

臺灣史學

傳承、方法、趨向

王晴佳 著





歷史與文化叢書 20

臺灣史學五十年(1950-2000)：
傳承、方法、趨向

Writing History in Taiwan: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1950-2000

王晴佳 (Q. Edward Wang) 著

麥田出版

歷史與文化叢書 20

臺灣史學五十年(1950-2000)：

傳承、方法、趨向

Writing History in Taiwan: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1950-2000

作者：王晴佳
主編：盧建榮
責任編輯：鄧立言
發行人：涂玉雲

出版：麥田出版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電話：(02)23517776 傳真：(02)23519179

發行：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愛國東路100號1樓

電話：(02)23965698 傳真：(02)23570954

郵撥帳號：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www.cite.com.tw E-mail：service@cite.com.tw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字樓504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馬新發行所：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M) Sdn. Bhd. (458372 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 3833 傳真：603-9056 2833

印刷：凌晨企業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405號

初版一刷：2002年8月

ISBN：986-7895-81-9

售價：28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序言

也是一番反省

許倬雲

王晴佳教授的大作，對於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分爲三個階段，指出由史料學爲主流，轉變爲以社會科學處理歷史，而在最近則以本土歷史爲顯學。他由閱讀史學研究及訪問有關學者，取得此結論。他的觀察，能夠掌握臺灣學術發展的大方向。臺灣歷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學者們曾有一番努力，致力於擺脫外在政治干擾。然而，在薩依德所稱族群認同的要求，終於政治又捲走了學術的自主性，——這是十分令人感慨的事！

王教授將我放在臺灣史學發展的第二代。我上承史語所師長前輩的教誨，第三代中的歷史學家中，又有不少曾與我有過師生香火之緣。論所屬世代，我的確屬於五十年臺灣史學發展途徑上的第二代。但是王教授謬許我在第二代史學開展時，曾有前驅之功。這一定位卻不是我敢於接受的。第二代史學工作者努力將歷史學與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考古學、政治學諸學科之間，多一番觀照，俾彼此都能有所啓迪。那是1960年後，二十餘年來，學術界的共同努力，不是一兩個人可以左右的。我在60年代，正值時代的浪潮正在湧起，躬逢時

會，遂得有參預其事的緣份。至於最近族群認同引發學術政治化的發展大勢，也不是一兩個人可以鼓勵，更非學術圈子內的事。緣起緣滅，由當代的形勢，醞釀為世變。我已年老力衰，早已不在弄潮之列。目前以觀潮人的角度，對於上述世變，自然有一番感慨。

回顧王教授指陳的第一代「史料學派」的時代，其背景是在大陸開展的長期演變。中國傳統史學大致受制於兩個使命。一是以褒貶人物，強化儒家行為倫理，並以朝代正閏，確立政權的合法性。另一則是研究典章制度，汲取歷史經驗，作為決策參考；也從研究天人之際及族群關係，作為參悟人事世變的資料。這兩項使命，遂使中國傳統史學，滲雜了相當程度的工具性，不能發揮一門學科的學術主體性。

十九世紀，西方世界挾其軍事與經濟的力量，鋪天蓋地而來，中國經歷了數千年未見的變局。一切單純來自中國歷史的經驗，失去了過去居之不疑的參考價值。西方文明成為主要的鏡鑒。中國的史學傳統，正如中國文化系統的其他傳統，也必須另闢蹊徑。

救亡與啓蒙，在清末以來，即是中國人必須面對的雙重壓力。歷史學家更難以置身事外。王教授引證錢穆先生與余英時先生所說的「史觀學派」，實際即是中國知識分子為了探索中國的前途，而為中國及中國文化體系尋找歷史長河上的定位。從梁啟超、章炳麟，…以至三十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的不少參戰者，其中專業的歷史工作者其實不多，「歷史」其實成為知識分子都能自由出入的園地。

從這一時代特色看，社會進化論的唯物史觀，要革西方資本主義的命，中國知識分子很容易有「與子同仇」的感覺，而且這一史觀許諾了未來的大同世界，也毋寧為中國知識分子帶來了「黑暗中的光明」。這一「史觀學派」的浪潮，在那次「中國社會史的論戰」之後，泛濫各處，遂使有些專業的歷史工作者，也不得不屈從於其先設

的主張。1950年以後的大陸歷史學界，更是淪為政治的工具，至今大陸漸漸開放，歷史學卻依然是這樣的局面！

另一個未有命名的史觀學派，應是民族史觀。推翻滿清的口號，本身是漢人的民族主義。這一族群認同的訴求，上承中國「內諸夏而外夷狄」的傳統，下開界定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的新意義。於是張之洞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本末之別，國故學者往往將西方制度及科技學說，在中國傳統中尋找我們「古已有之」的痕跡。日本侵華日亟，抗戰軍興，錢穆先生在警報聲中，講授國史，其貫注的精神，也是民族史觀。是以《國史大綱》對於中國文化的優美之處，發揚闡釋，甚多卓見。

傅斯年先生推動史料研究，並且建立了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實為中國第一個現代的專業研究機構。他強調史料本身的研究，是承受了德國蘭克等人研究第一手檔案資料的傳統。這是史學擺脫神學束縛的一個重要轉變。然而，即使傅先生強調史料的研究，他規劃史語所的組織：分為歷史、語言、民族、考古四個組，也是因為他在德國留學時，這四門學科，都是顯學，而且彼此支援，互相印證。我們必須注意，日耳曼民族要從羅馬教廷脫身而出，重建族群認同，殆屬必然進行的工作。為了確認日耳曼的族群認同，德國的學術界投身於探索諸侯譜系、民俗傳說、語言演化、遺址考古、城鎮沿革及其世俗特性…等項目。傅先生是一位強烈的民族主義者，我們這些臺大的老學生，至今仍能回憶老校長的愛國情操。他為史語所規劃的四個組別，其實也在以專業的學術分工，將歷史資料羅列於世人眼前，俾世人認識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的由來及其融合過程。基本上，傅先生有其民族史觀，只是他堅持不具先設意見的專業工作，是獲得歷史真相的基礎。基礎不夠堅實，則上面建構的歷史，都可能只是意

見，而不是知識。在這一點，傅先生堅持歷史研究必須從史料研究為根本，未嘗不是正本清源之道。同時，由於他理解到歷史發展的證據，不但見於傳統的史籍文獻，也見於考古學、民族學…諸學科取得的材料；於是他提出了「動手動腳找材料」的口號，要求歷史工作者將史料的來源推展及於各種學科工具可以發掘蒐取之廣大範圍，而不限於從故紙堆中找消息。

傅先生對於史料的定義，實已提示我們歷史學應當是跨越學科的學問。王晴佳教授將我列為臺灣第二代史學的開拓者，以為我們這一代是離開史料學派，另闢蹊徑。其實，從我自己的學習研究西方，不過是遵從傅先生取材各方的教諭，借用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諸姊妹學科的方法，榨取更多的訊息，作為重建古人生活的素材。這是一個發展過程，並未背離史料學派的務實傳統。

王教授指出，我們這一代史學工作者，頗致力於將歐美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引入臺灣的歷史研究。是的，我們這一代在50-60年代負笈海外，在美接受了30-4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科學長足發展以致50-60年代的豐碩成果，反觀中國的情勢，30年代的學術發展一度蓬勃，旋即抗戰軍興，接著又是內戰，大家救死不遑，一切學術發展舉步躊躇不前。50年代的臺灣，歷史研究秉持30年代留下的傳統，我的師長們勤奮工作，仍有開掘不盡的資料，取得豐碩的收穫。相形之下，一些社會科學的姊妹學科，則大多有田園荒蕪的窘況。我們到了美國，大致對於社會科學的發展，都有深刻的印象。我在芝加哥大學讀學位時，韋伯的理論正引起美國學術界的注意。他所提出權力、地位及觀念諸項因素間的互相影響，對於我關注的先秦社會變動，甚具啟發。同時，我在芝加哥學習的近東考古學，對我所關注的中國古代文明發展，也有彼此比較之用。從那一時期開始，我經常利用比較研

究及理論研究，建構一個「應該如此」的模式（亦即韋伯的「理想模式」），然後以此模式與中國古代歷史呈現的情況相比，由此探索中國文化發展的諸項特色。社會科學諸學科，正如一般科學，是爲了尋找「通性」，歷史學則爲了探索每一時空條件下的「特色」。但是，如果沒有另一模式爲參考，我們何以能找到某一個案的特色？所以，「殊相」必有「共相」對照，始能呈現其特殊之處。中國的歷史學傳統，何嘗不建構理想的共相？只是傳統史學往往從中國文化圈內不同時代的個案，作爲建構共相通性的參照資料。傳統史學中，某一型態的政治（治世、亂世）某一型態的人物（忠奸、賢愚…），何嘗不是歸納許多個案，建構爲一具有通性的印板？——這是我所理解社會科學對於歷史學研究的參照功能。有人以爲，借重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爲硬套其理論於中國歷史，那是誤解了我與一些同行學者的工作方式。又有一些人以爲我有時從量化資料說明歷史現象，即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這也是誤解。有些資料可以量化，有些不能量化，我們不應以爲有了數字與表格，即是「科學的」研究。以上兩點，其實是老生常談，卑之無甚高論，卻也是我必須解釋的實況。

王教授指出，臺灣第二代史學研究的題目，漸由國家政治軍事及典章制度，轉變爲社會經濟諸項課題。這一變化，毋寧是世界性的趨勢，但在60年代的臺灣，變化速度迅速，幾乎有一時風貌變易之勢。我以爲，中國近代歷史上，國家主體性常佔優勢，歷史研究矚目於國家，亦頗自然。臺灣在60年代，社會主體性逐漸露頭。我們在海外時，更早已深感社會主體性之重要。於是，我們這一代，不但將研究課題轉移於社會經濟方面，同輩的知識分子也有不少投身於提升民間社會的主體性，爭回長期由國家操持的權力。心之所念，就自然成爲自己研究的題目了。70年代以後的臺灣，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主體性比

重，漸漸移向社會，似乎與60年代時學者的努力，頗有呼應。

我自己反省當年的研究方向，覺得既有時代趨勢同步的變化，也未嘗沒有主動投入，求能有所推挽的心願。學術工作終究會與一時一地的情勢相左右，其功罪難知，也許竟是難以躲開的事實。我自己於70年代再度來美，事實上也因為在上述扶助社會以對抗國家的爭衡過程中，「槍打出頭鳥」，遂不能不自我放逐。個人的命運，禍兮？福兮？今日行年七十，也已不須再問。所幸國家的強勢壓力，已經不能如舊日之氣概。

王教授書中所說的，第三代史學工作的重點，似可分為兩個項目，一為由社會經濟史轉變為文化史，一為由中國史轉變為臺灣的本土研究。先說第一個項目：從社會史轉為文化史，雖然法國年鑑學派的影響是一個可見的因素，臺灣於經濟起飛及政治開放以後，個人的自覺也使個人主體性抬頭。我們這一代從國家爭到了社會主體性，我們的下一代又從集體的社會主體性爭取自覺的個人主體性。臺灣日漸走向社會的開放與政治的民主，日常生活及心態，遂成為大家關心的題目。中研院三個史學的研究群，近年來都趨於這一方向。這又是一次學術與社會風氣互動的現象。

第二個項目是臺灣本土歷史的研究，正在迅速成為臺灣的顯學。自從90年代以來，如眾週知，臺灣與大陸之間，不再是國民黨執政時代呈現的內戰延長。在李登輝主政時間始，臺灣明顯走向獨立的方向。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必須建構國族。於是，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知識分子致力建構國族的工作，今日在臺灣又須重起爐灶，再做一次。然而，閩粵地區，漢人移植臺灣的歷史，彰彰在目；臺灣文化不能自外於中國文化，也是難以否認的現實。因此，這一切斷源頭，另闢天地的工作，十分艱難，而有意造作的斧鑿痕跡也終究難以自圓其

說。以中國與臺灣為兩元對立的極化對抗，則更有自陷困境的窘態。

杜正勝提出臺灣—華夏—世界三重同心圓的模式，正如「大學」八條目的步驟，由近而遠，先桑梓而後天下，當是較有彈性的解釋。不過，在全球化浪潮正在瀰漫之時，如果世界化與本土化直接焊接，「華夏」一層可能壓縮至無形，臺灣可能成為號稱多元的拼盤文化，實質上將兼收併蓄，各處的文化紛至沓來，臺灣的本土文化，於消除中國成份後，也難有自立的本錢，更遑論建構自足的文化理念與生活方式。於是，臺灣勢將實質上淪為東洋西洋經濟上及文化上的共同屬地，喪失了真正的自主性。

至於王教授指出，為了營造建構安德森與霍布斯邦所謂「想像的共同體」，有些人不惜任意取捨與扭曲史實。可是，不少經過扭曲的史實，還在大家記憶之中，則營造新的「共同記憶」，難免有悖歷史學盡力求真的基本操守。因此，雖然臺灣本土化的工作，其性質頗為類似上一世紀中國的建構國族的過程，卻又有不易自圓其說，左支右絀的難處。首先提出「東方主義」觀念的薩依德教授，在其新近發表的論文集 *Reflectionson Exileand Other Essays*（我姑且譯為「薩氏離騷」）一書中，針對巴勒斯坦建國運動中建構歷史的現實，指出建構認同而出現的政治化（Identitypolitics），會出現因本土化而走向自囿於地方主義（parochialism）的危險，遂致與世界化大勢背向而駛。同時，建構狹窄的認同，又勢將強化排他主義，以致在小圈子中孤芳自賞，自閉於一隅而不能自拔，更遑論可久可大的開展與躍昇。

薩依德原籍巴勒斯坦，成長於埃及與敘利亞，在英國讀書，在美國執教三十八年。他的一生，都在外地，我讀他的自傳，「鄉關何處」，常有戚戚之感。在上述論文中，他對於中東的變故，深有感慨，甚至以為過分執著於故國本土，可能竟有自遮自蔽的盲點。王教

授本書所揭，一部分第一代及一部分第三代的史學研究，是否也正在薩依德所說的兩難局中？第二代的史學研究，因其以通性共相為參考鏡鑒，以尋求一時一地的特性殊相，或是可以匡救自囿自閉癡候的一味特效藥。如果能落實第三代史學研究的三重同心圓模式，臺灣的史學界可能找到脫困的出路。最近史語所正在嘗試發展世界史的研究，遠景是將該所工作定位為「歷史學」的研究，以人類歷史為注視對象，中國歷史與臺灣歷史都是近取於切身經驗，卻不是只以自己歷史為唯一研究範圍。這一工作如能成功，臺灣歷史學界的努力，對於本土，對於中國，對於世界其他各處的史學，都將有重要的啟沃作用。王教授的大作，實際上亦由史學發展呈現一部臺灣歷史。本書客觀詳實，誠為佳作，謹為序，並作推薦。

許倬雲謹序於匹茨堡

2002年二月十二日

壬午年元旦之夜

前言

歷史研究以過去爲對象，自不待言。但有趣的是，歷史學家對自己的過去，其興趣並不與生俱來。從中外史學的發展來看，史學史的研究只是近代以後的事；史學史課程在大學的開設，則要更晚一些。這一現象，不僅有趣，而且重要，體現了歷史意識和史學觀念的擴展與深化。首先，倘若史家沒有認識到實際的歷史與著述的歷史的區別，即歷史與史學的差別，史學史的研究便不會出現。其次，倘若在歷史研究中，史家一直遵循一種歷史觀念、採用一種史學方法，史學史的研究也就缺乏內容。複次，如果史家沒有看到歷史研究與社會現實之間始終存在一種互動，進而導致歷史研究的不斷變化，史學史的研究也就成了一本史家的「點名冊」、甚至「點鬼簿」，不但使人興味索然，而且也喪失了研究的意義。既然史學史的研究是史學觀念進展的產物，開展史學史研究應當有助於我們認識歷史意識的產生和變遷，並了解這些變遷與各個時代之間的聯繫與互動。

本書以過去五十年臺灣的歷史研究爲主要研究對象，但其重點則在描述和分析歷史意識的變化。因此，筆者所關心的範圍，可以說是既廣又狹。廣的地方在於，本書不但敘述了歷史研究在臺灣的發展和變化，同時也涉及其它與史學相關的領域，特別是臺灣文學界在構造臺灣歷史意識上所表現出的努力。對於歷史研究之社會影響，筆者也通過對歷史教科書的分析，而有所描述。狹的方面則是，本書雖然是一本臺灣史學史，以在臺灣工作的史家的作品爲基本分析素材，但筆

者並無意對臺灣史學在各個方面的成就，作一總體評述。如果讀者想從本書中，看到對某種、某類歷史研究的具體回顧，甚至對某人、某書的具體評介，那就可能會非常失望，因為限於學力，筆者無力作此類的概括和評介。筆者的寫作宗旨，只是想對臺灣史學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變化發展，從一個外部觀察者的角度，作一鳥瞰，希望能指出其發展的淵源、變化之原因和未來之趨向。

具體而言，筆者對臺灣史學演變的解釋，著重於內外兩個方面及其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和作用。所謂內部的方面，首先指的是史家在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上所建立的某種共識。隨著歷史研究本身的發展變化，這一共識產生變動，造成史家興趣的轉移，因而開墾新的領域、發現新的史料和採用新的方法，由此而形成新的研究趨向。當然，這些內部的變化因素，並非空中樓閣，而是與史學外部的因素相互作用，兩者同時促使變化的最終實現。而外部的因素，則涵括甚廣，舉凡政治的變動、外交的成敗、社會的要求、鄰近學科的影響和海外同行的啓發，都可包括在內。就臺灣而言，其島嶼的地理環境和複雜的歷史經驗，也使得這些外部因素對歷史研究，造成至為明顯的影響。在解釋臺灣史學的演變中，筆者無意衡量這內外兩個方面影響的輕重軒輊，只是想探討兩者之間的互動。但從其發展趨勢來看，外部的影響有愈來愈加強的傾向。換言之，史學與時代之間的交織、互動，愈到近年愈加明顯。這也是歷史研究在世界範圍的共同趨勢。但儘管如此，我們還應同時注意這兩個方面，因為歸根結底，歷史研究有其自主性，其變化有反映時代精神的一面，但也有表現學科發展內在需求的一面；後者能使我們看到，縱有外部世界的千變萬化，歷史研究仍有其固有的規則和理念。在這過去的五十年中，像世界範圍的史學一樣，臺灣的歷史研究產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史學作為一門傳統的、獨

立的學科，仍然生機勃勃，其道理也許就在於此。

從內外兩方面的影響考察，筆者把臺灣史學的發展變化，分為三個時期，在本書中由上、中、下三編來代表。在篇幅上則厚今薄古，下編最大、中編次之，上編最小。第一個時期從1950年至1960年代的中期，代表的是臺灣史學的初創時期，其發展受到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是與中國近代的史學傳統，特別是所謂「史料學派」保持著密切的聯繫。由於傅斯年的關係，中研院史語所和臺灣大學，成為臺灣歷史研究的重鎮，其學風被史界同仁視為歷史研究的楷模，並通過教學和出版而影響到新一代的歷史學家。二是冷戰的政治環境，使得當時的臺灣史界有一種復興中華文化的危機意識，以成為中華文明的正統代表為己任，使得臺灣的歷史研究，以中國史的研究為中心，力圖延續和擴展民國時代的史學傳統。而冷戰的外部環境，也使得臺灣自然而然地成為西方人士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尋求制約共產主義在亞洲擴張的一個重要基地。中研院近史所的建立及其與美國學術界和基金會的緊密關係，就是一個典型的事例。

從1960年代中期開始至1987年，臺灣的史學在內外兩個方面都經歷了顯著的變化，為第二個發展時期。雖然臺灣史學仍以中國史的研究為中心，但在理論和方法上開始有了明顯的改變。由於臺灣史界與西方史學之間的密切接觸，不但西方史學家頻頻來臺灣訪問，臺灣自己培養的學生也去西方留學，在這一時期回臺長期或短期的「傳道授業」，使得西方史學思潮很快波及到臺灣，其標誌是將社會科學（社會學、經濟學）的方法引入歷史研究，從而造成社會史的興起。這一社會史的潮流，不但與西方史學的新潮相呼應，而且與中國近代史學的傳統也有所銜接。《食貨月刊》的復刊及其在新一代史學家當中的廣泛影響，就是一個顯例。社會科學化的歷史研究，注重田野的

調查和數據的分析，使得臺灣成為「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社會科學界流行的「現代化理論」，也導致史家開始從事中國各地區的「現代化研究」，臺灣自然也成為其中之一。臺灣史的研究，由此便登堂入室，成為歷史研究的一個分枝。

臺灣史學由於其內部發展的需要而開始注意本土的傾向，由於1970年代臺灣國際地位的變化，而迅速得到強化。臺灣「正統中國」地位的喪失，使得臺灣人的歷史意識，產生危機，迫使史學家重新尋找自己的定位。史學界中有關清代臺灣社會「土著化」和「內地化」的討論，就表現了認同意識的變化。文學界有關「鄉土文學」的討論，黨外反對勢力的逐步壯大，國民黨內部的本土化趨向，新一代史學工作者的走向成熟，都使得臺灣的歷史研究在這一時期，產生了引人注目的變化。其中一個表現就是希求在吸收西方的理論和方法之外，也尋求開發本土的資源，使得臺灣史家對史學方法論的認識，又更進了一步。1979年創刊的《史學評論》，其英文標題是「中國歷史評論」(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其內容則尋求史學方法的多元化(「量身定做」，「史無定法」等等)，便是一例。

1987年解嚴之後，臺灣史學進入了第三個時期。由於政治的民主化、威權政體的逐步解體、新聞與言論的空前自由，使得歷史研究的禁區，一個個被打破，以前封閉的檔案資料也向外開放，因此臺灣史學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其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臺灣史的興起，成為一門名副其實的「顯學」。在臺灣史之外，史學界的一個顯著變化就是生活文化史的勃興。1990年創辦的《新史學》雜誌，成為這一新研究領域的主要園地，由此而吸引和團結了新一代的史學工作者。臺灣史研究早期的開展，也往往與這種力圖突破政治、軍事史的束縛，將眼光移向邊緣、女性、弱勢、下層的史學傾向，有所一致，因

此與生活文化史的開展，有相互砥勵、促進的作用。但是，臺灣史「顯學」位置在這一時期的確立和穩固，標誌著它已經走向「中心」，獲得了政治上的「正統」地位，因此其政治色彩也就愈益濃厚。1997年由於《認識臺灣》教科書的試用而引起的政界、民間、媒體和學界的激烈爭論，表示出歷史的書寫，特別是臺灣史的研究和教學，已經變成當前臺灣政治的一個重要部分，成為呼籲獨立建國的一個主要論述。對臺灣史研究所表現出來的民族主義史學的特徵，學界的人士有所警惕和批評。但臺灣目前的內外情勢又決定了民族主義的思想模式，仍然會對臺灣的歷史研究，有重大的影響。如何在史學觀念、史學方法上進一步突破，是二十一世紀臺灣史學發展所面臨的新挑戰。

筆者對史學理論、史學史的興趣，已有許多年，但開始研究臺灣史學，還僅是在幾年以前。其中原因，無法詳述，但筆者自1993年以來對臺灣的多次訪問，與臺灣史家的交往和參加各種會議，顯然是重要的因素。1999年1月至7月，筆者得到臺灣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的獎助，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訪問，正式開始這一課題的研究，並完成有〈臺灣史學的「變」與「不變」：1949-1999〉一文，發表於《臺大歷史學報》（24期，1999年12月，頁329-374）。2001年夏，筆者又再度訪問中研院臺史所，為本書的寫作進行補充研究。筆者感謝上述機構對我研究的支持和援助，特別是時任史語所的所長杜正勝和現任臺史所的所長劉翠溶。在這兩年中，為寫作此書，筆者曾訪問過下列人士（有的還不止一次），如陶晉生、李亦園、孫同勛、李國祁、杜正勝、黃寬重、邢義田、古偉瀛、黃進興、黃俊傑、張朋園、張玉法、阮芝生、黃富三、蒲慕州、熊秉真、蕭璠、王汎森、張瑞德、吳文星、林富士、陳弱水、周婉窈、盧建榮、梁其姿、黃克武、沈松橋、鄧世安、蕭阿勤、祝平一、廖咸浩、張隆志、

林玉茹、彭明輝、蔣竹山、潘光哲等，特此致謝。除此以外，古偉瀛爲我聯絡採訪人士，張寧爲我尋找、影印資料，出力很多。黃寬重向筆者提供了他自己保存的有關「食貨討論會」、「國史討論會」和籌辦《新史學》雜誌的各種尚未公開的材料，使我對那一段時期史學界的變化，有了深入其內的了解。國科會人文處的前任處長黃榮村和現任處長王汎森，都對筆者的研究，提供了許多方便。王汎森還安排我採訪長期在國科會人文處工作的羅曼真女士，有助於我掌握臺灣學術界的總體狀況及其發展演變。對於這些幫助，筆者表示由衷的謝意。

許倬雲先生在百忙之中，兩次接受訪問，並願意爲本書寫一序言，爲之增色不少。余英時先生對筆者的研究，也多有指點，在此一併表示深切的謝忱。本書的寫成，則要感謝盧建榮先生的鼓勵和督促，使其能濫竽他主編的「麥田歷史與文化叢書」之列，十分榮幸。本書的觀點與錯誤，則應由筆者一人負責。